

# 霍達文选

长篇小说

补天裂

人民文学出版社



补天裂

霍達文选

长篇小说

人民文学出版社

## 本卷提要

本卷收入长篇小说《补天裂》。

1898年,英国殖民主义者胁迫清朝政府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广东新安县的大部土地和海域,即所谓“新界”,租期九十九年。这是继1842年《南京条约》、1860年《北京条约》之后,中、英两国在香港问题上签订的第三个不平等条约,中华民族从此蒙受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奇耻大辱。

1984年,中、英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百年国耻,一朝洗雪,作者怀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激情奔赴香港,在仍处于港英统治下的港岛和新界搜集当年抗英保土斗争的素材,查阅中外文献资料,采访各界人士,踏勘历史遗迹,钩沉被湮没的史实,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潜心创作,呕心沥血,历时数载,终于在香港回归祖国前夕完成了这部小说。

《补天裂》正面展现了“香港拓界”的惨痛的历史,通过京师举人易君恕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亡命香港的坎坷经历,以及他与“新界”爱国志士联合十万乡民抗英保土而惨遭血腥镇压的悲壮之举,谱写了中华民族抵御外侮、宁死不屈的慷慨悲歌。作品规模宏大,情节扣人心弦,结构严谨精致,文笔凝重典雅,具有史诗气派。作者着力塑造了易君恕、邓伯雄、邓菁士等爱国志士的英雄群像,对英国牧师林若翰、香港少女倚阑、清朝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两广总督谭钟麟、港督卜力、港府辅政司骆克及警察司梅轩利等人物的刻画亦有独到之处。

《补天裂》1997年发表于《十月》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专号,同年5月北京出版社和香港明报出版社分别出版单行本,2008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修订版。《人民日报》(海外版)自1997年5月21日

至7月24日连载,《北京晚报》自1997年4月11日至7月31日连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自1997年5月21日至7月31日在《小说连播》节目全文广播,并于6月30日晚在香港主权交接仪式之前播出其中高潮部分篇章。1999年作者将小说改编为剧本,北京市广电局、北京电视台、北京中北电视艺术中心拍摄三十集同名电视连续剧;2007年作者重新编剧,中华海外联谊会、中国电影基金会再度拍摄四十集电视连续剧《苍天圣土》。

1999年,《补天裂》获第七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长篇小说奖和电视剧奖,并被中宣部、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广电总局、中国文联、中国作协评为建国五十周年十部优秀长篇小说之一;还曾获得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北京文学奖荣誉奖、北京市优秀图书奖等多种奖项。

## 序 血泪心声

刘白羽

霍达写出了《补天裂》一部大书。我说是“大书”，因为它是不平凡的，我用四句话来概括：大气磅礴，玉洁冰清，慷慨悲壮，撼地震天。

我很感谢霍达，在香港回归祖国的时候，她率先献出这么一部杰出的作品，这是作为一个作家之所了不起的地方。她这几年很辛苦，但是历尽艰辛，终于完成了。像我们这一辈人，自幼就经受着祖国被列强宰割的痛苦，我活到八十多岁，终于等到了香港回归的这一天，标志着中华民族实现完全统一的开始，我们十二亿人在爱国主义的大旗下团结起来了，凝聚起来了。

霍达是一位天才的女作家，她有撑天之力，动地之心，字句透着灵性，篇篇如闻天籁，形成她无比的艺术魅力。《穆斯林的葬礼》一大手笔也，有喜有怨，旧的在崩溃，崩溃得可爱；新的在诞生，诞生得有情，这是一部家族史；现在《补天裂》则是一部宏伟的民族史，我为作者感到得意之处，是从黑暗的历史深处掘出烁然之光，“新界”抗英之战，标志出中国人宁可站着死，不会跪着亡的巍然神魂。霍达把中华民族精神，提到大宇宙的无垠高度。读到结尾处，我不禁掩卷而泣：那一道血流，流了一百年，才流出飘飘然的香港区旗呀！

霍达是一个中华的好女儿，没有她那深深的爱国主义，怎能写出字字血泪、句句心声的《补天裂》！读完慨然而叹，拍案而起，遥望东方，红日曛曛。梁启超曰：“……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由于《补天裂》充满这种精神，它堪称二十世纪

文学之绝唱。拿破仑云：中国睡狮一旦醒来，全世界将为之震恐。《补天裂》之所以能有如此力量，盖有霍达之志、之气，才能勃然一呼，天地霹雳。有大人才能写大书，我为《补天裂》祝！

（1997年6月6日，刘白羽先生在长篇小说《补天裂》出版座谈会上做了充满激情的发言。1999年2月21日，老人又抱病根据发言记录稿写成此文，作为新版《补天裂》的序言。）

谨将此书献给我的祖国和历尽劫难终于回归祖国怀抱的神圣领土香港；

谨将此书献给一个半世纪以来在香港问题上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奋斗的一切志士仁人；

谨将此书献给在香港这片血染的土地上为抵御外来侵略、反抗殖民主义统治而英勇牺牲的烈士们，他们永垂不朽！

——作者，1997年7月1日

# 目 录

序 血泪心声 .....	刘白羽 ( 1 )
第 一 章 落花时节 .....	( 1 )
第 二 章 报国无门 .....	( 37 )
第 三 章 书生论政 .....	( 66 )
第 四 章 无力回天 .....	( 98 )
第 五 章 天涯孤旅 .....	( 132 )
第 六 章 烟雨楼台 .....	( 161 )
第 七 章 灵肉鬼神 .....	( 197 )
第 八 章 海隅落日 .....	( 228 )
第 九 章 月照无眠 .....	( 270 )
第 十 章 潮涨潮落 .....	( 302 )
第 十 一 章 圣土遗民 .....	( 344 )
第 十 二 章 山雨欲来 .....	( 383 )
第 十 三 章 寸土必争 .....	( 419 )
第 十 四 章 剑拔弩张 .....	( 454 )
第 十 五 章 天若有情 .....	( 490 )
第 十 六 章 谁家天下 .....	( 530 )
第 十 七 章 血染国门 .....	( 562 )
第 十 八 章 世纪婴啼 .....	( 606 )
后记 看试手,补天裂 .....	( 646 )



## 第一章 落花时节

公元 1898 年，大清国光绪二十四年，岁次戊戌。

暮春时节，古都北京才徐徐露出一些春意，山杏、碧桃、丁香、海棠、榆叶梅次第开放。而来自居庸关外的北风却也挟裹着漫天黄沙，呼啸不止，把好端端的春色葬送了。残萼败蕊，落英缤纷，真正是“寂寞开无主”。当年以奇才名满天下的龚定庵，曾有诗单道这京城落花：“如钱塘潮夜澎湃，如昆阳战晨披靡，如八万四千天女洗脸罢，齐向此地倾胭脂！”一支生花妙笔，绘声绘色，惊心动魄，却也凄凉而又无奈。等到风沙渐歇，不觉过了清明、谷雨，那短暂的春天已匆匆逝去，立夏就在眼前，天气骤然热了起来，礼部依例奏请皇上批准，朝廷官员换去暖帽貂裘，开始戴凉帽、着夏服了。

天色空濛，太阳从薄云后面透出一轮惨白，慵懒地照射着禁宫内苑三海一山，照射着九门五城纵横街衢两千胡同十万人家芸芸众生。然而在这平静的空气之中，似乎孕育着某种躁动不安，一场惊天动地的大风暴正在步步逼近……

东单牌楼底下，川流不息的人群之中，一位年轻人步履匆匆地往北走去。

此人高挑身材，头戴玄缎便帽，身穿银灰色直罗夹袍，外罩古铜色亮纱暗花马褂，身后垂着一条油黑乌亮的大辫子，脚下双梁布鞋。他年纪在二十七八，肤色白皙，面目清癯，两道长长的剑眉，一双深邃的眼睛，鼻梁挺且直，口阔而唇薄。此刻，他眉头微蹙，嘴唇紧闭，脸颊上便显出两道对称的月牙形细纹，隐隐有悒郁之色。他目不斜视、大步流星地径直向前走去，那副神情，既不像寄情声色犬马的纨绔子弟，也不像留连京都街肆的远方客商。显然，他是一个久居京城的人，对这里的大街小巷了如指掌，现在正有一件紧急的事情去办。

东单牌楼北大街已经走到了尽头，再往前就是东四牌楼南大街了，这两条街首尾相连，中间并没有明显的分界，而北京人却把它们看做两条街，分别隶属于南北相望的两座牌楼。他走到这里，抬眼看了看两侧，左首是西堂子胡同，右首是东堂子胡同。

他向右首拐了个弯儿，走进了东堂子胡同。

远远地，他望见胡同里的一座大门楼，门前停了好几顶绿呢官轿，旁边守着一些穿着号衣的轿夫。他于是放慢了脚步，缓缓走上前去，端详着官轿后面的那座门楼。

这门楼呈品字形，三开间重檐覆瓦，红柱方础，颇似一座牌楼，虽不甚高大，却也威严。正中门楣之上，悬一块匾额，书“中外禔福”四个大字。匾额下面，牌楼两侧，分开站着两名荷枪实弹的卫兵，头戴红缨伞形帽，身穿号衣，两腿笔直地鹄立，表情木然地望着前方，连眼皮儿也不眨。从牌楼往里再有三尺进深，才是真正的院门，一名蓄着络腮胡子的彪形大汉在悠闲地踱步，不时用眼睛的余光瞟着外面。那是朝廷大员的侍从武弁，满洲话叫“戈什哈”，就是“护卫”的意思。

年轻人朝这座牌楼式的大门走去，离“中外禔福”的匾额还有两丈远，正要拱手相问，门旁持枪鹄立的卫兵已经厉声发出了警告：“站住！”随即，那位蓄着络腮胡子的戈什哈快步走来，警惕地看着他，竖起右手的大拇哥指着后头，问道：“嗨，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年轻人没有回答，他不习惯这种连个称呼也没有的问话。

戈什哈当他是个“雏儿”，鼻子里哼了一声，自个儿回答自个儿的问话：“这儿，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不理民间诉讼，是专跟洋人打交道的地方！”

年轻人正色说：“这，我知道。”

“知道？”戈什哈一愣，沉下了脸，“那还不躲远着点儿？”

“我有要事……”年轻人说。

“噢？”戈什哈听了这句话倒乐了，笑咪咪地打量着他，好似一只吃饱喝足懒懒洋洋的猫碰上了个小耗子，虽然无心吃了它，却倒要拿它逗逗闷子，“请问，您是哪国公使？到此有何贵干哪？”

年轻人没有回答。他当然不是洋人，这一点，对方从他的相貌、穿着、话语便可以判断无误，所以才敢于这样奚落他。大清国的总理

各国事务衙门是为洋人开的，本国百姓只有“肃静”、“回避”的分儿。假如他生就一副高鼻蓝眼，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了，对方则不知该怎么巴结才好。他当然也知道，如果此时递给对方一份“门包”，自己虽然没有高鼻蓝眼，事情也还有商量的余地，大清国的任何规矩都是可以破的，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世上没有银子敲不开的门。然而他不屑于此，自己胸中酝酿的那件大事，本不足与面前这种董超、薛霸式的小人物道。他只用锐利的目光盯了戈什哈一眼，好似要把那颗头颅穿透似的。咳，他在心里说，可怜，可怜！然后，便转过脸，背起双手，缓缓走去。

他并没有走远，只在这条不长的东堂子胡同来回踱步，不时地抬眼看着这座衙门，脸上泛出一丝冷笑，轻声念着匾额上的题字：“中外禔福”。

这块匾，这座衙门，历史虽不算悠久，但比他的年龄还要长些，算起来已经有三十七八年了。

早在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三日即公元1861年1月13日，恭亲王奕訢、大学士桂良和户部左侍郎文祥联名上折：“窃惟夷情之强悍，萌于嘉庆年间，迨江宁换约，鴟张弥甚，到本年直入京城，要挟狂悖，夷祸之烈极矣……”这里所说的“江宁换约”，是指当年在鸦片战争中大清国惨败于英吉利，道光二十二年即公元1842年8月29日，英军兵临南京城下，大清国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战战兢兢地爬上英舰“康沃利斯”号，与英国全权钦使璞鼎查签订《南京条约》，把香港割让给英国，开放五口通商，并赔款二千一百万银元；“本年直入京城”，也就是奕訢、桂良、文祥上折的咸丰十年刚刚发生的事，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焚毁圆明园，恭亲王于九月十一、十二日即公元1860年10月24、25日，和英国全权钦使额尔金、法国全权钦使葛罗分别签订《北京条约》，割让九龙司给英国，增设天津为商埠，赔款由《天津条约》中规定的英国四百万两、法国二百万两增加到两国各八百万两，准许英、法在大清国招募华工出口，等等。随后，俄国也自恃调停有“功”，向大清国提出领土要求。恭亲王深感“各路军报络绎，外国事务头绪纷繁”，应接不暇，乃出面联合桂良、文祥，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专责成也”。咸丰皇帝看了这道折子，当即御笔朱批：“惠亲王、

总理行营王大臣、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妥速议奏。”

惠亲王绵愉领旨遵议，六天之后，于十二月初九复旨上折，“恭亲王奕訢等筹议各条，按切时势，均是实在情形。”第二天即十二月初十，咸丰皇帝便降旨批准“京师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着即派恭亲王奕訢、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管理，并着礼部颁给钦命总理各国通商事务关防”。这件大事从提议到批准，只用了短短一个星期的时间，可谓急如星火，刻不容缓。

然而，凭空增设一座衙门，毕竟不是一句话的事儿，临危受命的三位大臣肩膀上担子沉重，不能不详加策划。起初，他们曾打算借礼部的地盘设立公所，办理一切，想想又觉得不妥：礼部乃国家考论典礼之地，本不是办理“夷务”的地方。如果借用礼部大堂接待外国人，让那些红毛洋鬼进进出出，既不成体统，也极不方便。但若是仅仅借用礼部司堂，规格又太低，怕洋人未必心服，说大清国怠慢了他们，那就会没茬儿找茬儿，无事生非。看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非有个单独办公的地方不可。现有的各衙门，都是很庞大的，少者房屋百余间，多者则达数百间，一个个机构臃肿，冗员充斥。奕訢、桂良、文祥认为，“此次总理衙门，义取简易”，不打算也不可能照抄以往老套，于是再次上折，奏“总理衙门未尽事宜”，并且附上他们三人草拟的《章程十条》。“查东堂子胡同，旧有铁钱局公所，分设大堂、满汉司堂、科房等处，尽足敷用，无容另构。惟大门尚系住宅旧式，外国人往来接见，若不改成衙门体制，恐不足壮观，且启轻视。拟仅将大门酌加改修，其余则稍加整理，不必全行改修，并拟由臣等自行估修，以期迅速而资节省。”于是在大门之外建起了这座牌楼，以壮观瞻。有关人员的设置，恭亲王等主张，“总理衙门规制较异，无庸多立名目。拟于司员内择其老成练达者，挑满汉各二员作为总办，再择二员作为帮办，办理折奏照会文移等事。”他们久居官场，深知各衙门都是“额缺既多，候补尤众”，连一些才具平庸、没有办事能力的人也跟着混饭吃，所以特别指出，“总理衙门司员甚少，未可滥竽充数，各衙门保送满员，则于郎中、员外郎、主事、内阁侍读、中书，汉员则择拔贡、举人、进士出身之郎中、员外郎、主事、内阁侍读、中书充补。无论候补、实缺人员均准保送，惟须老成谨飭、公事明白、品行醇正者，出具考语咨送。由

臣等考试文理字迹,是否优长,公事是否明白,分别去取。不得以捐纳及未经奏留资格较浅之员充数。”至于经费,他们提出,“经费宜节,以杜浮滥也。查各衙门司书役,均有桌饭公费等项,以资办公。每月所费,悉于衙门解到饭银内开支,并有支领库项者。此次总理衙门,未便援照办理,以致经费浮滥。拟将司员供事仅与值班桌饭,均无庸另给公费饭银,应用心红纸张,亦无庸于各库咨取。所有一切心红纸张桌饭,以及苏拉等工食,每月不得逾三百两之数。”那么这笔钱从哪里来呢?他们打算从天津和上海两地的关税中想办法,修理衙门的费用就只好向户部支领了。《章程十条》的最后还不嫌繁琐地赘上一笔,“现查铁钱局除改作衙署外,尚有炉房,稍加修葺,堪作馆舍”,供那些“认识外国文字通晓语言之人并学生等”住宿。堂堂的大清国,连开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等大事都只好穷凑合,可见已经穷到了何等地步!

咸丰皇帝当天便有廷寄上谕:“所有单开各条,经朕详加披览,尚属妥协。惟内酌拨经费一条,所称‘心红纸张等项银两,拟于天津、上海酌提关税起解部款内,按各口提用数目,均匀酌提银两,由各该将军督抚尹监督解总理衙门,以资办公’等语,此项银两,亟资办公,恐各口酌提,一时未能应手。着即按照所定每月支领银两数目,经由户部关支,将来各口解到酌提关税银两,统交户部,无庸解交总理衙门,该衙门如有不敷之处,即奏明由户部支领。”

看来,皇帝比他们还着急。等米下锅不是办法,先从国库拿了银子再说。于是,在圣上隆恩眷顾下,由恭亲王亲自出马张罗,把铁钱局的旧房子改了个门脸儿,里面基本维持原状,只粉刷裱糊了一番,大清国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便草草开张,挂牌营业了。英、俄、法、美、德诸国使臣随即便蜂拥而来,或要割地,或要赔款,或要种种特权和利益,仿佛大清国欠下了他们八辈子也还不清的债。

岁月匆匆,咸丰之后是同治,同治之后是光绪,转眼间三十多年过去,大清国每况愈下,惟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只出不进的赔本儿生意却越做越红火,终日顾客盈门。始作俑者“鬼子六”恭亲王奕訢,经历了协助慈禧发动“祺祥政变”之后的大红大紫,光绪十年却又被慈禧一个闷棍打倒,“开去一切差使,并撤去恩加双俸”,责其“家居养疾”。

至甲午中日战争，朝廷用人之际，经李鸿藻、翁同龢合词吁请，光绪皇帝秉承慈禧皇太后懿旨，才重新起用奕訢，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添派海军事务，在内廷行走，又任军机大臣，节制各路统兵大员。奕訢经过人生的大起大落，权势野心已不复当年之盛，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小心翼翼仰太后鼻息，只求得一善终。

当年恭亲王奕訢和桂良、文祥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时，曾经有过一番精彩的表白：

臣等综计天下大局，是今日之御夷，譬如蜀之待吴。蜀与吴，仇敌也，而诸葛亮秉政，仍遣使通好，约共讨魏。彼其心岂一日而忘吞吴哉？诚以势有顺逆，事有缓急，不忍其忿忿之心而轻于一试，必其祸尚甚于此。今该夷虽非吴、蜀国之比，而为仇敌则事势相同。此次夷情猖獗，凡有血气者，无不同声愤恨。臣等粗知义理，岂忘国家之大计，惟捻炽于北，发炽于南，餉竭兵疲，夷人乘我虚弱而为其所制。如不胜其忿而与之之为仇，则有旦夕之变；若忘其为害而全不设备则贻子孙之忧。古人有言：“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事。”洵不易之论也。

时至今日，这位以诸葛亮自比、声称无一日不忘“吞吴”的恭亲王已气焰将尽，卧病在床，朝不虑夕。大清国的外交仍然“以和好为权宜”，也不知“权宜”到何时，当年那番豪言，徒留笑柄而已。如今的外交事务，由庆亲王奕劻主持，他自光绪十年奕訢遣贬之际，便受命主管总理衙门，十多年来，集内政、外交大权于一身，炙手可热。光绪二十二年九月，素有“中国第一外交家”之称的文华殿大学士、原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奉旨“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

现在是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四，公元1898年4月24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刚刚复照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许诺“不将福建省内之地方让与或租与别国”，以保证日本的“势力范围”，紧接着又在进行一场中英谈判。

大堂门口，两名“苏拉”垂手而立，随时听候召唤。“苏拉”为满洲语，本义指闲杂人等，大清国内廷机构中的勤务，通称为“苏拉”。

大堂之中，并排悬挂着大清帝国的黄龙旗和大英帝国的米字旗，

设一张红木长案，宾主分列两旁，犹如纹枰对坐，黑白对弈。不过，中国自古以来的确是这样下棋，而用于两国谈判，还是跟洋人学来的，自鸦片战争以来，也已经习惯了。

中国方面，谈判代表是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李鸿章，经筵讲官、礼部尚书许应骙，尚书衔户部左侍郎兼署吏部右侍郎张荫桓。其中以李鸿章职位最高，他头戴白罗胎凉帽，珊瑚顶，插三眼花翎，身穿四爪九蟒官袍，仙鹤补服，项挂一百零八颗珊瑚朝珠，脚蹬玄缎厚底官靴，腿边斜倚着的一根笔直光洁的西式手杖，系美国前总统克利夫兰的遗物，由克利夫兰的夫人赠予。李鸿章年已七十有六，本来高大的骨架，已经坍塌松懈，肩背有些佝偻；脸上的皮肉软软地下垂，眼睛下面呈现两个鼓鼓的泪囊，稀疏的胡须已经全白了。

英国方面，全权代表是驻华公使窦纳乐爵士（Sir Claude Mac Donald），他身材修长，着黑色燕尾服，雪白的领口上打着黑色领结。脸庞瘦削，棕红色的头发已经略显谢顶，更加衬托出宽阔的额头。高耸的眉弓下，戴一副金丝眼镜，一双灰蓝色的眼睛熠熠闪光。高挺的鼻子下面，两撇小胡子留得很长，弯弯地朝上翘着。此人 1852 年出生于苏格兰一个陆军军官家庭，1872 年从军，1888 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896 年任英国驻华公使，现年四十六岁，集军人气质、外交家风度于一身。

窦纳乐正在操着高傲的英语阐述英国的立场，面前放着一沓文件，还有一个包扎整齐的羊皮纸卷。中英两方的通事各自操着紫锋狼毫和鹅管笔紧张地笔录。等他的发言告一段落之后，中方的通事再一字不漏地用汉语转述一遍，如若某处用词不够准确，英方的通事还要以嘲弄的口吻加以纠正。而在窦纳乐叽里咕噜地发言的时候，听不懂英语的李鸿章恰好可以喘息片刻，以准备应付下一个回合。

望着强硬的对手，李鸿章鼻腔里发出无声的叹息。想想自己自从同治二年以江苏巡抚兼五口通商大臣之职创办洋务，同治九年继曾国藩之后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和洋人打了几十年交道，在别人看来，位高权重，名利双收，实则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回头看去，光绪二年的中英《烟台条约》、光绪十年的《中法会议简明条款》、光绪十一年《中日天津会议专条》和中法《会订越南条约》、

光绪二十一年的中日《马关条约》、光绪二十二年的《中俄密约》，及至最近的中德《胶澳租界条约》、中俄《旅大租地条约》，都是经他之手签订的，不是割地赔款，就是予人特权。每当朝廷危难之际，总是把他推出来，用热脸贴洋人的凉屁股，一次次在屈辱的条约上签字画押，那滋味儿好受吗？

去年冬天，德国借口巨野教案出兵强占了胶州湾，俄国随之占领旅顺、大连，上个月法国又提出租借广州湾，列强瓜分中国之势已成。李鸿章凭着他多年与洋人打交道的经验，已经预感到英国人绝不肯甘落他国之后，为了保住在华的既得利益，必然也会玩出稀奇古怪的新花样。果然，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提出了租借威海卫的要求。庆亲王奕劻不得已只好应允，但希望英国在租得威海卫之后，不得更索利益。窦纳乐当即回答说：“本公使拒绝对此做出保证。大英帝国向贵国租借威海卫，只是为了防御来自北方的威胁；而在南方，如果法兰西占领了广州湾，那么我们也要别索一处以抵。”他所说的“别索一处”指的是哪里，当时并没有明说。

这项谈判从本年阴历三月二十日正式开始。窦纳乐说：“大英帝国的香港殖民地不满足于它目前的界限，希望展拓界址，以为保卫香港之计。”仍然没有指出他要拓展到多大范围。

庆亲王答道：“香港拓界一事，当可两国磋商，但希望贵国对敌国的领土要求，到此为止。”

窦纳乐当即拒绝：“很遗憾，亲王殿下！我不能接受您所提出的任何此类条件，因为大英帝国必须充分考虑自己的利益，如果德意志、俄罗斯、法兰西各国有所动作，我们将不得不采取对抗的行动！”

话说得十分强硬，却又一如既往，含含糊糊，使人不知道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就在初次会谈的第二天，窦纳乐单独拜会李鸿章，似乎是解开这个谜团的时候了。

一见面，窦纳乐就说：“关于香港拓界问题，早在去年年底，贵国两广总督谭钟麟阁下就曾对我国驻广州领事璧利南表示，‘不难就略为展拓一事做出安排’。”

窦纳乐在身居宰相之位的李鸿章面前引用两广总督的话，企图



以此来说服他，显然是十分不得体的。李鸿章根本不把谭钟麟放在眼里。谭钟麟虽然是四朝元老，官居一品，年已八十有余，但至今没有人阁拜相，仍然是个地方官。北京有总理衙门统领外交事务，两广总督无权就国土的租让向洋人做出任何许诺。即便在未设总理衙门之前，当年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义律在穿鼻洋上胁迫两广总督琦善“准许英人在香港地方一处寄居”，琦善也只是答应代为恳奏皇帝，未敢签字画押。纵使如此，道光皇帝已经雷霆震怒，将他革职锁拿，抄没家产。这不过是五十多年前的事，谭钟麟竟然不知教训，擅自向洋人许诺香港“拓界”，看来，两广总督的那把交椅，他恐怕也快坐到头了！不过，话又说回来，这香港的“拓界”之事，既然下有谭钟麟垫背，上有庆亲王点头，他李鸿章身上的责任反而轻得多了。想到这里，就对窦纳乐说：“庆王爷已然发了话，如果展拓范围不大，可以商量。但不知贵国究竟希望把香港的界址展拓到什么范围？”

谁知窦纳乐还是含糊其词，语焉未详，只是说：“大英帝国对于展拓香港界址的要求，不会超过防御所需要的范围。”

李鸿章很恼火。心想：你既然明火执仗地上门来抢，就干脆说清楚要什么，我们也好打发，何必这么忸忸怩怩呢？难道还要我们开个单子，主动奉送不成？“防御所需要的范围”，谁知道你们的“防御”需要多大的范围？中国与英国，远隔重洋，五十多年前你们的兵舰还不是开到中国来了吗？如果说这也算“防御”，那么普天之下的土地都可划入你们“防御”的范围之内了！

心里虽是这么想，嘴里却不敢说。窦纳乐起身告辞，把一个闷葫芦仍然留给了他。

李鸿章心里总不踏实。过了两天，他以回拜为名，来到东江米巷英国驻华公使馆，借着上次窦纳乐的话头，点了他两句：“据上次贵公使所说，贵国之意在于香港港口两边设防，修筑炮台之类，那么，所占不过方寸之地，拓界请不要超过这个限度！”

当时双方约定在闰三月初四，即公历4月24日——也就是今天，再次谈判，想必窦纳乐已经把他要用于“防御”香港的地盘规划完毕，李鸿章早已等得不耐烦了。

.....